

心理账户视角下农地流转不畅的机理解释及其再造机制探究

郑沃林¹,曹壹帆²,邹宝玲^{2,3*}

(1.广东金融学院信用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2.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3.西南大学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要 农地流转是改造小农户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农民普遍将农地流转给亲友邻居的行为并未完全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对此,基于心理账户理论解构农户农地流转对象选择的发生学机理。研究表明,(1)农地的产权属性导致农户形成农地心理账户,并根据交易对象的差异性,分割成熟人心理账户和陌生人心理账户。(2)根据心理账户的核算规则,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是因为收益(由即期收益和预期收益构成)大于损失(由显性成本构成);转给陌生人是因为收益(由即期收益构成)小于或等于损失(由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构成)。为此,促进农地要素市场化的关键在于提高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或者降低损失。基于江西绿能公司的案例及“广东千村调研”的实证检验发现:以村委为主体,引入社会资本促进农地流转,帮助农户“土地入股参股”,搭建农地流转服务平台或集中流入农户土地再流转出去是促进农地要素市场化的路径。

关键词 心理账户;农地流转;熟人;陌生人;契约形式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2)04-0193-09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2.04.017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微观单位,并形成了“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导致的分散小农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显现^[1]。农村土地细碎化和小农分散经营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障碍。如何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成为时代命题。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小农户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提高小农户经营效率。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以农地流转为手段,改造小农户和小农经济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方案^[1]。

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我国农地流转面积占承包地总面积的比例为0.44%,1999年为2.53%,2008年为8%。对此,不少研究给出的解释是,在农地家庭承包制下,地权分配是基于国家强制性的安排而非自由市场的配置,从而存在模糊产权风险^[2]。农户因担心产权得不到保障而表现出较低的农地流转意愿^[3]。考虑到在产权明晰且稳定的状态下,市场会自动解决交易问题^[4]。因此,2009年,农地确权颁证全面实施。相对于之前的第一轮和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重新确认土地空间信息,以法律凭证的形式明确了农户对农地的权利,从而降低了产权模糊

收稿日期:2021-09-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路径与政策研究”(21AZD032);清远市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度规划课题“清远市生态资产评估及其价值实现路径研究”(QYSK2022018)。

*为通讯作者。

性。得益于此,农地流转率不断提升。农业农村部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农地流转面积占承包地总面积的比例增长为16.2%,2014、2015、2016年分别为30.4%、33%、35%^[5]。

尽管农地流转率逐年增加,但农民流转农地并未完全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而是普遍将农地流转给亲友邻居。农地分散化的经营格局亦没有因农地流转率的提升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产权明晰后农地流转效率还是不高呢?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与产权实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强调权利静态赋予,后者强调权利动态运动^[6];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当产权边界被明晰界定,侵权行为才得以证明;当产权无限度时,产权权能难以有效实施,行为人无法对排他性控制的预期价值作出反应,利益也无法实现^[7]。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农地确权颁证解决产权界定的问题,那么产权实施将是影响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8]。产权实施与行为人的行为能力密切相关。Umbeck对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的产权实施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行为能力是行为人用强力排除竞争者的能力,至少包括排他能力和交易能力,排他能力表示阻止他人侵权的能力,交易能力表示让渡资产权利的能力^[9]。为了避免排他能力和交易能力过低引致的成本过高,农户往往将农地流转给熟人,通过熟人社会的长期预见性及其机制来保证产权权利独占和收益独占的可能性。

容易忽略的是,产权实施除了取决于行为能力外,还受产权主体对产权属性利用、控制的影响^[10]。产权实施是一个“保留”或“放弃”的选择。如果行为人认为产权行使带来的收益超过成本时,会出现产权实施的动机及其行为;如果他们认为产权行使带来的收益难以补偿成本的损失,就不会主动去行使产权^[7]。显然,产权实施还取决于行为人对收益与成本的比较。理论上,在比较收益和成本后,农户将农地流转给市场主体更符合理性经济人决策^[11]。事实却相反,这说明农户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并不是追求理性认知方面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情感认知方面的效用最大化,即农户很可能在无意识地把农地的价值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情感体验在农户流转农地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此推断,农户很可能无意识地把农地的价值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且由于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运算规则,进而导致违背理性的农地流转行为发生^[3]。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关于农地流转非市场化的解释:一是农地确权颁证之前,对于农地流转意愿较低的现象,已有研究从“产权界定”与“市场效率”的角度,讨论了农地产权不明晰的负面影响;二是当农地确权颁证后,对于农地流转普遍发生于熟人间的低效率现象,已有研究从“产权界定”所衍生的“禀赋效应”给出了解释,认为农地确权颁证强化了农地的产权强度,巩固了“土地是命根子”的人格化意志,进而抑制了农地要素市场化进程。但是,已有研究忽略了“产权界定”和“产权实施”是不同的,农户是否流转是“产权界定”的问题,但农户将农地流转给谁则是“产权实施”的问题。鉴于“产权实施”基于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即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农户应当将农地流转给市场主体,但是实践却呈现出更多的熟人之间的农地流转现象。为此,针对这一现象仍需进一步深入讨论。

本文立足于心理账户理论,基于“现象—问题—已有解释—本文视角”的逻辑展开,力求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解构农户关系型自发性流转的发生机理,揭示农地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思路。本文试图剖析农户心理账户的内隐结构,并解构农地流转对象指向性的传导机制;以江西绿能公司为例证,从实际层面揭示在心理账户约束条件下土地要素市场化的实现机理,并在此基础上,以“广东千村调查”数据对农地要素市场化的实现机理进行实证检验;最终得出农地要素市场化的相关结论与建议。

一、理论框架的构建

1. 农地流转的目标及特征

通常来说,物品的交易表达为让渡物品产权,即产权主体的转换。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产权主体之所以愿意让渡物品产权是因为交易行为能够实现收益最大化。由此,农户流转农地的最终目标是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农户流转农地的决策往往呈现以下两方面的特征。其一,私利性。农户流转农地对收益的追求具有明显的私利性。正是因为私利性的存在,农户流转农地不仅追求理性认知方面的效用最大化,更是追求情感认知方面的满意最大化。其二,选择性。尽管农地流转最终

结果会带来收益,但农户将农地流转给不同的主体所产生的收益不尽相同,而且“每一次交易涉及一份契约”。现实中,农户难以完全获得缔约前的相关信息,也不能估计缔约后发生的变化,从而不可能在缔约前将这些信息和变化清楚地写进契约当中。所以,契约总是不完全的。农地流转总会伴随不同程度的成本。既然成本无法回避,如何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在成本和收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就成为农地流转对象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意味着,农户流转农地的对象选择以“成本—收益”的比较作为依据,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使自身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

2. 农地流转隐含的成本与收益

兰德曼认为“人是未定型的存在,自然只完成人的一半,另一半留给人类自己完成”^[12],而马克思的观点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人的存在具有社会属性,而且社会属性反映人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或社会关系之中^[14]。按照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解,“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5]。换言之,人与人的关系因亲疏不同而呈现出差序化特征。

据此,按照“自己”与他人的亲疏关系,农地流转的对象可以被划分为熟人和陌生人。那么,在产权主体开放的条件下,农户流转农地往往有两种选择:流转给熟人或流转给陌生人(表1)。如果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他将得到即期收入(L)、预期收入(M)及付出显性成本(I)。即期收入(L)是指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获得的租金,预期收入(M)是指人情租(即未来可在流转对象中兑现的实物或服务),显性成本(I)指流转必须投入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搜寻成本、溢价成本。农户将农地流转熟人的收益为 $L+M$,成本为 I ,从而形成的利润为 $L+M-I$ 。

如果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陌生人,他会获得即期收入(L^*),并会付出显性成本(I^*)和隐性成本(C)。其中,即期收入(L^*)是指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陌生人获得的租金,显性成本(I^*)指流转必须投入的成本,隐性成本(C)包括事后监督成本(C_1)与未来收益损失(C_2)。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陌生人的收益为 L^* ,成本为 I^*+C ,从而形成的利润为 L^*-I^*-C 。

表1 农地流转隐含的成本与收益

流转对象	收益	成本	利润
熟人	L (即期收入)、 M (预期收入)	I (显性成本)	$L+M-I$
陌生人	L^* (即期收入)	I^* (显性成本)、 C (隐性成本)	L^*-I^*-C

3. 基于心理账户的农地流转对象选择

Thaler认为,人们会根据财富的来源与存储方式、支出的项目的不同,在多个账户分别进行运算^[16]。所以,人们作出决策的过程实质是对多种选择可能发生的结果进行估价的过程。至于如何估价,最基本的方式是对多种选择可能发生的结果进行收益与损失的共同评价^[17]。为此,Thaler提出了心理账户理论,并认为心理账户的运算规则符合价值函数的变动规律,即“收益”和“损失”都呈现出边际递减特征,由此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收益”与“损失”编码规则,即在相同条件下,相对于“获得”,“损失”对人的影响更明显^[16]。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获得”与“损失”的不同组合偏好及其决策结果:第一,当存在多笔收益时,两者带来的效用为正,从而促进了决策行为发生。第二,当存在多笔损失时:两者带来的效用为负,而且亏损曲线为凹形且递减,从而抑制了决策行为发生。第三,当存在一笔收益大于另一笔损失时,收益产生的正效应比损失产生的负效用更大,从而促进了决策行为发生。第四,当存在一笔收益小于或等于另一笔损失时,如果收益小于损失,损失产生的负效用比收益产生的正效应更大,从而抑制了决策行为发生。如果收益等于损失,考虑到亏损曲线比盈利曲线更加陡峭,损失产生的负效用比收益产生的正效应更大,从而抑制了决策行为发生(表2)。

从产权属性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土地私有制的背景下,大部分农户对农地只是拥有永佃

权,仅占有田面而不占有田地。对于这些农户来说,农地是经典地租理论所强调的生产资料要素。而对于拥有农地产权的农户来说,农地不仅是生产资料要素,也是可靠的投资品,能够通过自由交换契约来获利。所以,农地产权能够被货币所替代,与一般商品并无差别。正因如此,农户不会专门设立心理账户。新中国

成立后,特别是全面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依据集体成员资格的天赋性和公平性,以家庭为单位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此背景下,农民拥有的农地产权是经由国家强制的制度安排而完全不经过市场途径获得的。农户拥有的是嵌入“农地集体所有权”之中的“准所有权”。农民享有使用权和收益权,而缺乏所有权和转让权,这意味着农户无法永远“卖断”土地,从而割裂了农地产权与货币的对等性,使得农地独立于一般商品之外。考虑到农地与一般商品的来源存在差异,农户会对农地设立心理账户(即总分类账户A)。从市场交易的角度,农户流转农地决策是农地产权的暂时让渡行为。但是,将农地流转给熟人或陌生人所产生的“收益”和“损失”并不相同。因此,农户在流转农地决策发生时,根据农地流转对象的差异性,而形成两个明细分类账户,即熟人心理账户(A_1)和陌生人心理账户(A_2),并结合农地流转隐含的收益和成本,以心理账户运算规则为依据,选择最能满足心理感受的结果(表3)。

表2 心理账户的核算规则

情景分类	心理效用	决策行为
多笔收益	正效用	促进行为发生
多笔损失	负效用	抑制行为发生
收益大于损失	正效用	促进行为发生
收益小于或等于损失	负效用	抑制行为发生

表3 农地流转心理账户的核算规则

总分类账户	明细分类账户	收益	损失	心理核算规则
农地心理账户(A)	熟人心理账户(A_1)	L和M	I	$L+M$ 大于I,“收益”大于“损失”
	陌生人心理账户(A_2)	L^*	I 和C	如果 $I+C \geq L^*$,则“损失”大于或等于“收益” 如果 $I+C < L^*$,则“损失”小于“收益”

在熟人心理账户(A_1)中,“损失”由显性成本(I)构成。不过,由于农户与农地流转对象的关系亲密,使得信息呈现对称性,农户与熟人之间难以隐藏私人信息,也不能不接受对方的信息,从而很清楚对方的资源禀赋。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成本、搜寻成本等显性成本。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使得农村社会成员互相依赖,并重视角色认知意义上的面子。面子观使得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时,不会对流转租金过分计较,从而降低了议价成本等显性成本。所以,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的显性成本(I)相对较低,甚至可以忽略。“收益”由即期收入(L)和预期收入(M)构成。其中,即期收入(L)相对较低,而预期收入(M)具有不确定性,并且现实中农户往往高估预期收入。究其原因,农户与熟人之间的交往具有长久预见性和低度选择性,从而构建了以“报”为行动逻辑的人情循环与互动规则。“欠人情”与“还人情”是不断循环发生的环节,在流转农地之前,农户很可能已经接受了熟人的帮助。这使得他们按照低于市场出清价格的标准收取租金,从而导致即期收入(L)相对较低。与此同时,农户不可能结算所有层面的人情亏欠,也无法脱离熟人的帮助。为了未来能够在流转对象中兑现相应的实物或服务(即预期收入),他们不会立刻要求流转对象提供较高的租金作为流转农地的补偿,也抑制了即期收入(L)的提高。另外,预期收入(M)取决于流转对象偿还“人情债”意愿的概率(P_1)以及流转对象偿还“人情债”能力的概率(P_2)。通常来说,农户与熟人的关系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构建的自然村落或宗族,由此形成的特殊信任、身份认同和声誉机制成为互帮互助的基础,其中也隐含着施报平衡的社会规则(即“如果不还人情,就不需要往来了”)。施与者兼有接受者的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流转对象偿还“人情租”意愿的概率。值得注意的是,农户是异质的,这不仅说明农户存在资源禀赋与偏好的差异性,更包含行为能力的差异性。对于行为能力不足的农户,他们很难偿还拖欠未了的人情债。而农户普遍不具备评估偿还“人情债”能力概率的技术,只能根据以往接受他人帮助的经历及记忆,来综合判断未来预期收益的概率。他们往往会忽略随机序列中各事件之间的独立性,当连续出现某一种结果,会不自觉地作出“将要出现的结果与前期结果相同”的判断。长期的互助实践与守望相助的价值观强化农户对未来可在流转对象那里兑现相应的实物或服务的

认知,从而导致农户高估预期收益的概率及其金额。由此,在熟人心理账户(A_1)中,“收益”远大于“损失”,这使得农户将农地流转的“损失”与“收益”整合看待,从而导致“损失”带来的痛苦会被“收益”带来的快乐所稀释,负效应得到抑制,并促进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

在陌生人心理账户(A_2)中,“收益”由即期收入(L^*)构成,即期收入(L^*)往往较高。传统理论认为,作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市场形成,完全市场结构以市场价格作为资源利用价值的载体,并以“价高者得”为竞价方式。即期收入(L^*)是市场中实现供给与需求双方平衡时的价格,由资源价值所决定,而资源价格由边际效应所决定,从而使得即期收入(L^*)包括了“有用性”和“稀缺性”两方面内容。其中,“稀缺性”表达为任何进入农业经营的主体要想获得该地块的经营权,必然得到该地块的农户同意。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稀缺性”是给定的,从而导致即期收入(L^*)相对较高。而“有用性”则取决于农户和潜在的转入户对于农地的生产要素的判断,这受地理位置、农地面积、肥力、灌溉条件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农户的议价能力,从而提高即期收入(L^*)。“损失”由显性成本(T)和隐性成本(C)构成,显性成本(T)相对较高但低于即期收入(L^*)。究其原因,农地流转对象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农户与潜在的农地流转对象之间可能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农户需要为此支付较高的信息成本、搜寻成本等来实现供需匹配,从而使得显性成本(T)较大。另外,隐性成本(C)并不确定。隐性成本(C)包括事后监督成本(C_1)与未来收益损失(C_2)。事后监督成本指在租约执行中,为避免流转对象潜在的违约行为,农户需要支付的监督成本。未来收益损失主要是指陌生人在耕种过程中可能存在对土地的过度利用,导致农地质量下降,最终造成农户的未来收益受损。隐性成本的大小与农户对农地提供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诉求的强弱相关。农户之所以对农地提供的生存权存在诉求,是因为农村生计保障机制不完善及非农转移人口始终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为此他们将农地视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保命田”。

农户考虑到自身在非农就业市场可能会遭受淘汰,为了能够有效地通过农地获得就业机会与养老资源,他们需要保证即使将农地流转给陌生人,不至于缺乏在位控制而发生地力折损、土壤污染等不可逆的现象,从而产生隐形成本。而农户对农地提供的生存权诉求的强弱与自身的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当处于人力资本优势地位时,他们才能在劳动力市场内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从而减少对农地提供的生存权的依赖。农户及其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与他们本身的“机灵”“想象力”和“判断力”等特质有关,这使得农户对农地提供的生存权诉求存在差异,进而导致隐性成本存在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农户对农地提供的发展权诉求受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府地力保护补贴以及制止“非农化”“非粮化”等行政措施的影响。例如,农地质量影响到政府地力保护补贴的发放,政府地力保护补贴往往由农户领取而非农地转入户,这促进了农户对农地流入户的农业生产行为的监督积极性,从而提高了事后监督成本这一隐性成本。由于显性成本(T)小于预期收入(L^*),但隐性成本(C)并不确定。因而,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讨论:(1)如果隐性成本(C)相对较大,使得显性成本(T)和隐性成本(C)之和大于预期收入(L^*),由此使得“损失”大于“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心理账户的核算规则,亏损曲线的斜率大于盈利曲线,亏损曲线比盈利曲线更陡,即人们对亏损的敏感性比对盈利的敏感性更为强烈。由此,“损失”带来的痛苦不会被“收益”带来的快乐所稀释,负效应没有得到抑制,从而导致农户将农地流转的“损失”与“收益”拆分看待。那么,损失规避的天性会促使农户拒绝将农地流转给陌生人。(2)如果隐性成本(C)较低,使得显性成本(T)和隐性成本(C)之和小于预期收入(L^*),由此使得“损失”小于“收益”,即“损失”带来的痛苦会被“收益”带来的快乐所稀释。这种情况下,农户将对农地流转的“损失”与“收益”整合看待,从而激励了流转行为发生;至于农户是否将农地流转给陌生人仍需要对比熟人心理账户(A_1)和陌生人心理账户(A_2)的剩余。

为了便于讨论,不考虑熟人心理账户和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成本,因此仅需要比较熟人心理账户和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大小。考虑到产权实施是一个“保留”或“放弃”的选择,在总分类账户(A)中,当农户选择一个明细分类账户的收益,另一个明细分类账户的收益成为机会成本,从而根据心理账户运算法则进行结果选择。熟人心理账户(A_1)的收益由即期收入(L)和预期收入(M)构成,而陌

生人心理账户(A_2)的收益由即期收入(L^*)构成;其中,即期收入(L)是社会成员主观博弈均衡的价格,而即期收入(L^*)则是市场出清价格,从而导致后者往往高于前者,如江淑斌等^[18]对江苏省684份农户进行研究并发现,农地流转租金在不同流转对象当中呈现差异性,其中,流转对象为熟人的租金在每亩400元以下,流转对象为陌生人的租金在每亩700元以上。尽管即期收入(L^*)大于即期收入(L),但农户往往高估预期收入(M),从而导致熟人心理账户(A_1)的收益大于陌生人心理账户(A_2)的收益。因此,在总分类账户中,根据心理账户的运算法则,当存在一笔收益大于另一笔损失(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视为机会成本,即损失)时,收益产生的正效应比损失产生的负效用更大。正因为损失带来的痛苦会被收益带来的快乐所稀释,农户往往将农地流转给熟人而非陌生人。

二、实施策略的解构

1. 心理账户与农地市场化策略:基于江西绿能公司的案例剖析

基于理论框架的分析,可以明确:第一,由于制度的差异性,农地与一般商品的来源存在差异,从而使得农户对农地设立心理账户(即总分类账户 A);同时,交易对象的差异性,使得农户在总分类账户 A 的基础上,形成两个明细分类账户,即熟人心理账户(A_1)和陌生人心理账户(A_2)。第二,心理账户的核算规则具有一致性,即当收益大于损失时,将促进交易的发生。第三,农户之所以将农地流转给熟人,是因为在陌生人心理账户(A_2)中,收益(由即期收益构成)小于或等于损失(由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构成)^①;或者是,虽然陌生人心理账户(A_2)中,收益(由即期收益构成)大于损失(由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构成),但在总分类账户中,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由即期收益构成)小于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由即期收益、预期收益构成)。为此,促进农地要素市场化的关键在于提高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或者是降低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损失(包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

据此,以江西绿能公司为案例^②,解构实现农地要素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江西绿能公司组建于2010年,是一家集土地流转、水稻种植、大米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也是江西省自营种植面积较大及带动农户较多的现代化农业企业。目前,江西绿能公司流入土地2万余亩、托管土地3万余亩。事实上,在农地流转初期,江西绿能公司面临着“流转难”“租金高”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提高农户流转农地的积极性,江西绿能公司提出以高于江西省安义县农地租金水平的200元每亩租金流入农地。即期收入的提高使得部分农民将农地流转给江西绿能公司。但是,大部分农民认为,“江西绿能公司转入农地是圈地行为,可能会种植桉树等折损地力的作物,到时候农地肯定被破坏”;在商谈的过程中,他们表示“宁愿将农地闲置也不愿意将农地流转给江西绿能公司”。这说明在陌生人心理账户中,尽管即期收入提高,隐性成本过高也会抑制交易的发生。为了降低隐性成本,江西绿能公司成立党支部,以村干部、党员为目标群体,通过与他们“交心、谈心”嵌入农村社会人情循环与互动的网络结构;同时,以行政村为单位,组建土地流转合作社。对于农民而言,他们是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而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则建立在“欠人情—还人情—再欠人情—再还人情”的先赋性社会关系之中,从而更容易表达为“礼物交换”,降低了隐性成本对流转决策的约束。而且江西绿能公司大力发展农地托管业务,这意味着江西绿能公司不直接地从农民手中转入农地,而是作为“代耕农”的角色帮助农民耕种闲置农地。江西绿能公司只享有管理费,不参与利润分成,产生的利润归农户所有。农地托管没有改变农户对农地产权的在位控制的事实,从而降低产权分割引致的隐性成本,并实现农地规模经济性。为了降低显性成本,当地的党委和政府成立了土地流转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该组织发挥了宣传流转政策、加强农民与江西绿能公司联系等作用,从而降低了农民的信息成本、搜寻成本和决议成本。特别是,在农地流转过程中,该组织协调农民与江西绿能公司可能发生的纠纷,降低双方调解成本。

① 或者说,在熟人心理账户(A_1)中,收益(由即期收益和预期收益构成)大于损失(由显性成本构成)。

② 与众多传统农业县一样,江西省安义县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常年从事非农产业,从而面临农地撂荒等问题。但与其他传统农业县不同,凌继河组建绿能公司仅用了10年的时间,租赁经营的耕地面积达到4.4万亩,先后被评为“全国种粮大户”等称号,成为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典型行业和行业学习的标杆。多个省市领导多次考察该公司,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也亲临公司视察,因此具有典型性。

2. 心理账户与农地市场化策略:基于“广东千村调研”的实证检验

从江西绿能案例可以发现,“招商引资”提高了农地流转的即期收入,“土地入股”减少产权分割产生的损失厌恶从而避免预期收入的下降,“流转服务中心”等媒介降低了显性成本,而“反租倒包”则降低了隐性成本。为了检验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本文使用暨南大学经济社会调查中心于2019年进行的“广东千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广东千村调查”数据采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抽取广东119个行政村、3622户农民家庭进行入户调查,覆盖粤东、粤北、粤西和珠三角等地农村,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模型变量的选择上,(1)被解释变量为陌生人心理账户交易是否达成,用农地流转契约类型作为陌生人心理账户交易达成程度的测度项,其中农户流转农地选择书面契约则表示陌生人心理账户交易达成,选择口头契约表示陌生人心理账户交易未达成。(2)解释变量包括:①是否有即期收入的提高措施,用村委是否引入社会资本促进流转来测度;②是否有预期收入的提高措施,用村委是否帮助农民“土地入股参股”来测度;③是否有显性成本的降低措施,用村委是否搭建流转服务平台来测度;④是否有隐性成本的降低措施,用村委是否集中流入农户土地再流转给市场主体(即“反租倒包”)来测度;⑤农户的基本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保险与经济状况等;⑥土地特征,如土地质量、高标准农田面积、确权情况等。具体变量的说明与描述统计见表4。

表4 变量说明与统计描述

变量	题项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陌生人心理账户交易是否达成	农地流转契约类型	口头契约=0;书面契约=1	0.644	0.479
是否有即期收入提高措施	村委引入社会资本促进农地流转	否=0;是=1	0.067	0.248
是否有预期收入提高措施	村委帮忙农户“土地入股参股”	否=0;是=1	0.083	0.276
是否有显性成本降低措施	村委搭建农地流转服务平台	否=0;是=1	0.166	0.373
是否有隐性成本降低措施	村委集中流入农户土地再流转给市场主体(即“反租倒包”)	否=0;是=1	0.025	0.155
性别	您的性别	男=1;女=2	1.143	0.350
年龄	您的年龄	实际值/岁	59.401	12.215
受教育程度	您的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及以上=4	1.614	0.705
婚姻状况	您的婚姻状况	未婚=1;已婚=2;离异=3;丧偶=4	2.175	0.611
医疗保险	您是否购买“新农合”等医疗保险	否=0;是=1	0.866	0.341
养老保险	您是否购买“新农保”等养老保险	否=0;是=1	0.081	0.273
家庭总收入	2018年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	实际值/万元	5.065	8.306
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总额占家庭消费支出总额比重	实际值/%	0.442	0.286
土地质量	您家的土地质量	很差=1;差=2;一般=3;好=4;很好=5	3.332	1.277
高标准农田面积	您家高标准农田的面积	实际值/亩	2.298	3.365
农地确权的块数	您家确权的承包地块数	实际值	3.735	7.819

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即期收入提高措施显著地促进了书面契约的达成;隐性成本降低措施显著地促进了书面契约的达成。在5%的统计水平上,预期收入提高措施显著地促进了书面契约的达成;显性成本降低措施显著地促进了书面契约的达成。由此说明,提高即期收入、预期收入或降低显性成本、隐性成本都能够促进陌生人心理账户的交易达成,从而促进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之外的市场主体,并提高农地流转的契约化程度。

三、结论与建议

以农地流转为手段,改造小农户和小农经济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种方案。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主体明确且允许产权自由转让并保证其中的收益,产权主体会在约束条件下配置要素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这决定了农地确权颁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现实却是,在全面推进农地确权颁证后,农

户没有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而将农地流转给亲友邻居,使得农地分散经营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少研究认为是禀赋效应抑制了农地要素市场化进程,而本文发现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陌生人的较低意愿并非源于农地产权界定层面,而是源于心理账户的核算规则及其产生的损益比较。为此,本文立足于心理账户的理论,解构农户农地流转的行为逻辑。结果表明:(1)通常意义,讨论物的归属是从物的“完整所有权”开始,但在中国,农户获得土地产权是通过国家强制的制度安排而完全不经过市场途径,进而导致了农地与一般商品的来源差异性。因此,农户往往形成农地心理账户,并根据交易对象的不同,分割成熟人心理账户和陌生人心理账户。(2)基于心理账户的核算规则,当收益大于损失时,会促进交易的发生。因而,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的根本原因是在陌生人心理账户中,收益(由即期收益构成)小于或等于损失(由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构成);或者是,虽然陌生人心理账户中,收益(由即期收益构成)大于损失(由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构成),但在总分类账户中,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由即期收益构成)小于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由即期收益、预期收益构成)。从这个角度看,促进农地要素市场化的逻辑在于提高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或者降低损失。(3)基于江西绿能公司的案例可以发现:以村委为主体,引入社会资本促进农地流转,帮助农户“土地入股参股”,分别提高了陌生人心理账户的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而搭建农地流转服务平台或是“反租倒包”则分别降低了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最后,以“广东千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也检验了上述策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要推进农地要素市场化,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以乡村振兴为契机,结合农业的区域特色,扶持下乡资本发展农地规模经营,不仅鼓励企业以租赁的形式参与到农业生产环节,还需要支持企业以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形式参与到农业经营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完善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的监督管理机制。第二,企业在流入农地的过程中,鼓励农民以自家承包地的“经营权”作为“股份”,入股农地规模经营的项目,并根据“股份”的比例享有利润分红。同时,根据地域、经济状况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差异性,探讨符合实际的入股方式及其配套政策。第三,建立农地流转数据库,搭建供需双方互通的流转服务平台,不仅鼓励兼业户、非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龙头企业,还可以支持他们(包括纯农户)将农地委托给龙头企业集中管理。第四,结合产业发展需求,按照统一的标准将村内分散化的农地流转到合作社,再通过“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形式,将农地流转给种粮大户、龙头企业,并且鼓励农民跟进学习,根据农户生产能力及其意愿聘用农户作为管理人员。为了避免产生暗箱操作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出台“反租倒包”的备案制度,并且按照“谁承包费高谁来承包”的原则,确定承包对象,构建与之相关的监管机制。

参 考 文 献

- [1] 李宁,周琦宇,汪险生.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角色转变研究:以农机服务对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为切入点[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7):40-58.

表5 Logit模型回归结果 N=330

变量	参数估计		边际效应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是否有即期收入提高措施	1.557***	0.593	0.308***	0.113
是否有预期收入提高措施	0.827**	0.407	0.164**	0.079
是否有显性成本降低措施	0.797**	0.364	0.158**	0.070
是否有隐性成本降低措施	1.691***	0.652	0.335***	0.125
性别	-0.486	0.443	-0.096	0.087
年龄	-0.024***	0.012	-0.005***	0.002
受教育程度	-0.003	0.184	-0.001	0.036
婚姻状况	0.169	0.215	0.033	0.043
医疗保险	0.527	0.412	0.104	0.080
养老保险	-1.011**	0.506	-0.200**	0.097
家庭总收入	-0.006	0.021	-0.001	0.004
恩格尔系数	-0.255	0.477	-0.050	0.094
土地质量	-0.211***	0.102	-0.042***	0.019
高标农田面积	0.047	0.048	0.009	0.010
农地确权的块数	0.011	0.016	0.002	0.003
常数项	2.252***	1.050	-	-
P值			0.000	
伪R ²			0.104	

注:*, **,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 [2] 叶剑平,丰雷,蒋妍,等.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17省份调查结果及政策建议[J].管理世界,2010(1):64-73.
- [3] 罗必良,郑沃林.产权特性、心理账户与农地流转[J].东岳论丛,2019,40(10):25-32.
- [4] ALCHIAN A. 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J]. Il politico,1965,30(4):816-829.
- [5] 朱建军,杨兴龙.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数量与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9(3):63-74.
- [6]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 [7] 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
- [8] 胡新艳,罗必良,王晓海,等.农户土地产权行为能力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中国26个省份农户调查分析[J].财贸研究,2013,24(5):25-31.
- [9] UMBECK J. Might makes rights —— a theory of the formation and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property-rights[J].Economic inquiry,1981,19(1):38-59.
- [10] 罗必良.从产权界定到产权实施——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过去与未来[J].农业经济问题,2019(1):17-31.
- [11] 仇童伟,罗必良.强化地权能够促进农地流转吗?[J].南方经济,2020(12):1-18.
- [12]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阎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 [13] 克拉克,黄炎平.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之命题[J].哲学译丛,1998(4):53-62.
- [14] PENG M W, LUO Y.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3):486-501.
- [15]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6] THALER R H.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J].Journal of behavior decision making,1999,12(3):183-206.
- [17] TVERSK A, KAHNEMAN D. Choices, values, frames[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4,39(4):341-350.
- [18] 江淑斌,苏群.农地流转“租金分层”现象及其根源[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4):42-48.

Mechanism Expla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Poor Farmland Transf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Account

ZHENG Wolin, CAO Yifan, ZOU Baoling

Abstract Farmland transf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o transform small farmers and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farmers generally transfer farmland to their relatives, friends and neighbors, which does not full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income. In this regar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ental account,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he genetic mechanism of the object selection of farmland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roperty right attribute of farmland leads farmers to form farmland mental account which falls into acquaintance mental account and stranger mental accoun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transaction objects. (2) According to the mental account rules, farmers transfer farmland to acquaintances because the income (consisting of immediate income and expected income) is greater than the loss (consisting of explicit cost), and they choose to transfer to strangers because the income (composed of immediate income)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the loss (composed of explicit cost and implicit cost). Therefore, the key to the marke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elements is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r reduce the loss of strangers' mental account. Based on the case of Jiangxi Green Energy Company and the empirical test of Guangdong Thousand Villages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marke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elements is to take the village committee as the agent, encouraging social capital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helping farmers in land equity participation and building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service platform or transferring out the concentrated farmers' land.

Key words mental account; farmland transfer; acquaintance; stranger; contract form

(责任编辑:余婷婷)